

中国古代 作家作品专题

研 究

主 编：王立群 张进德

ZHONGGUO GUDAI
ZUOJIAZUOPIN ZHUANTI
YANJIU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主编 王立群 张进德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 王立群, 张进德主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5 (2003.9 重印)
ISBN 7-310-01735-8

I. 中... II. ①王... ②张... III. 古典文学—专题
研究—中国 IV. I 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821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河北昌黎人民胶印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95 千字

印数 8001 — 13000

定价 22.00 元

序 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时间跨度最长、授课时间最多的一门课程。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对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以历史为线索，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史。这两个阶段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但是，仅仅修完这两门课程，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尚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在大学课堂上，这一任务是由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选修课完成的，而对于自学考试的学员来说，这一任务则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来完成。因此，《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是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代表作品进行专题研究，帮助应考者提高分析、评价作家作品的能力，为撰写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奠定基础。

本课程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教材选入的均是第一流的作家、作品，上起《诗经》，下至《红楼梦》，基本上涵盖了自先秦至清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并对他（它）们进行了专题介绍。这一介绍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与深化。它大体上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介绍的广度、深度均大大超过《中国古代文学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自考学员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有一个新的全面深入的了解。

本课程的名称为《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因此，“研究”成为本课程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这种研究又非编写者个人的学术研究，编写者个人的研究要融入整个学术界的研究之中，

不能以编写者个人的研究代替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学员们在学习本课程时,要注意了解学术界的最新研究信息、切入角度,注意研究者的评价。为此,本教材在编写中均附有某作家、作品的研究史。这些研究史,或长或短,或详近或略远,或重论述或重勾勒。但是,它们对自考学员了解某一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史,均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研究状况较为陌生的学员不啻是一导引,且是一指示研究门径的大纲。

学员在学习本课程时,自然需要记忆必要的基本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学习研究的方法,为以后撰写研究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打基础。因此,本课程就绝非一般的中文本科课程,而是一门带有指导研究性质的课程。学员在学习本课程时,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培养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这是本课程学习的关键之所在。

编者

2002年元月于开封

目 录

第一章 《诗经》研究	(1)
一、《诗经》的分类及有关问题	(2)
二、《诗经》的内容及思想	(13)
三、《诗经》的文学成就	(19)
四、《诗经》对后世之影响	(24)
五、《诗经》研究史概况	(29)
第二章 《庄子》研究	(35)
一、庄子的生平、时代与思想	(35)
二、《庄子》的版本、内容与文学特色	(42)
三、《庄子》的传播、影响与研究	(48)
第三章 《史记》研究	(56)
一、司马迁的家世及《史记》	(56)
二、《史记》的笔法	(63)
三、《史记》的艺术特色	(73)
四、《史记》研究	(78)
第四章 陶渊明研究	(87)
一、陶渊明的生平及陶集版本	(87)
二、陶渊明的诗歌内容	(89)
三、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	(95)
四、陶渊明诗歌的艺术贡献	(100)
五、有关陶渊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104)
第五章 李白研究	(116)
一、李白的生平、思想及性格	(116)
二、李白的诗歌创作	(121)
三、李白研究状况	(131)
第六章 杜甫研究	(143)

一、杜甫的生平	(143)
二、版本书目介绍	(149)
三、杜甫的思想	(152)
四、杜诗的思想内容	(155)
五、杜诗的艺术特色	(158)
六、杜诗的创作原则	(160)
七、杜甫研究状况	(163)
第七章 苏轼研究	(172)
一、生平与思想	(172)
二、苏轼的创作成就	(181)
三、研究概况介绍	(191)
第八章 辛弃疾研究	(206)
一、辛弃疾的生平	(206)
二、辛弃疾词作的内容	(208)
三、辛词的艺术成就	(211)
四、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15)
五、辛弃疾评论研究	(222)
第九章 关汉卿研究	(232)
一、关汉卿的生平及创作	(233)
二、关汉卿的公案剧	(235)
三、关汉卿的爱情风月剧	(242)
四、关汉卿的历史剧	(248)
五、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251)
六、关汉卿与其杂剧研究综述	(259)
第十章 《西厢记》研究	(266)
一、《西厢记》的作者及版本	(266)
二、《西厢记》的研究概况	(272)
三、“西厢”故事的演变	(277)

四、《西厢记》的思想内容与人物	(282)
五、《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289)
六、《西厢记》的影响	(294)
第十一章 《西游记》研究	(298)
一、《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298)
二、《西游记》的版本	(299)
三、《西游记》作者的考证	(301)
四、《西游记》研究现状概述	(306)
五、《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309)
六、幻笔、戏笔和寓笔	(317)
第十二章 《红楼梦》研究	(325)
一、《红楼梦》的作者	(325)
二、《红楼梦》的补作	(327)
三、《红楼梦》的思想	(328)
四、《红楼梦》的版本	(330)
五、《红楼梦》的艺术	(333)
六、《红楼梦》的研究	(353)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考试大纲	(358)
后记	(371)

第一章 《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殷商末年至春秋中叶六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是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之后的称呼。

《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它集结过程中就开创了“赋诗言志”的时代，而且在它问世之初，便已形成了“著书引诗”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诗经》于汉朝时便正式列为“五经”之一，以后由“五经”扩展为“九经”，进而扩展为“十三经”，《诗经》始终居于其中，成为儒家学者必读教材，而且在于《诗经》的原始性和经典性为文学、语言学、文化、宗教、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

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①

梁启超先生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贋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②可见，普及对《诗经》的了解，借以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探索《诗经》在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诗经》文本及与此相关直接或间接的、内部或外部的、社会或文化的、思想或艺术的、史学或考据的、文字或音韵的、民俗或学术的等方面，均有人作专门的研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以及今后的研究。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这些问题加以综合论述，以使读者能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

一、《诗经》的分类及有关问题

(一)关于《诗经》的分类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这在《周礼·春官》中就有记载，但对分类依据的认识分歧很大。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的，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不同而划分的，亦有认为是依据作品内容不同而划分的。众说皆有偏颇，较为接近事实的是音乐说：风诗为乡土之音，即诸侯所辖地域的地方俗乐；雅诗为朝廷之音，即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音乐；颂诗为宗庙之音，即宗庙祭祀时的舞乐。与此相类似的是乐器说，即风、雅、颂之不同在于演唱时使用的乐器不同。章太炎先生《大雅小雅说》认为：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张西堂先生《诗经六论》认为：“颂”与“镛”通用，镛即钟，钟则是人们常用的乐器；郭沫若先生认为：“南”即“铃”，铃也是一种乐器。由此郭老提出：《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孳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之言大鼓、花鼓、鱼琴、筒板、梆子、滩簧耳。这个看法很精辟，它进一步证实了《诗经》分类音乐说，正因为诗的分类依据是音乐，所以才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伴奏。

还应该点明的是，上海博物馆根据其馆藏竹简整理出来的《竹书孔子〈诗经〉》，认为战国时代《诗》分为讼、夏、邦^①，可见仅就《诗经》的分类，还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

(二)关于《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诗序已“认定”了许多。某公、某侯、某王、某妃之作，比比皆是，这种论断，我们自然难以苟同。依我们看，确定诗的作者，首先要取得内证，其次得依据《左传》等史书，不能想当然。依我们看，《诗经》的作者能确定的有6篇。《邶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左传·闵公二年》有许穆夫人赋《载驰》，且诗与史合，故可以认定。《小雅·节南山》有“家父作诵，以究王”，可认定家父为该诗作者。《小雅·巷伯》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可认定寺人孟子

为此诗作者。《大雅·崧高》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故可认定此二诗的作者为吉甫，即宣王时代的尹吉甫。《鲁颂·閟宫》有“奚斯所作，孔曼且硕”，可以认定此诗为奚斯所作。以下3篇的作者也基本可以确定，或至少可以作为一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故《小雅·棠棣》的作者为召公虎。《国语·楚语》有：“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於是乎作《懿》戒自儆也。”前人以为“懿”、“抑”相通，故有《大雅·抑》之作者为卫武公所作一说。《左传·文公元年》有：“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此诗为《大雅·桑柔》第十三章，故此诗作者可认定为芮良夫。此外，传统说法认为《小雅·小弁》为太子宜臼所作，《小雅·白华》为申后所作，《大雅·江汉》为召虎作，《商颂·殷武》为宋襄公作，虽无具体实证，但诗序以降，多有从之，亦可备一说。除此13篇，其余的292篇诗歌作者难以详考，在没有新的理由和充分的证据之前，暂作存疑为好。

(三)关于《诗经》产生的地域及创作的时代

《毛诗序》在认定《诗经》作者的同时，也认定了许多诗篇创作的时间，如成王时、康王时、厉王时、幽王时，言之凿凿，但证据不足。我们认为，前面已经认定或基本认定作者的13篇诗作，因作者明确，故其创作时间也基本可以确定。其余诸诗篇的创作时间，大多难以详考。我们只能依据其内容及传世文献，加以判定。

周南、召南究竟指哪些地方，古今说法甚多。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周、召分陕而治说。《史记·燕召公世家》有：“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不东，周公主之。”王夫之《诗经稗疏》有相同的论述：

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洛，南逾楚塞，以

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④

可见二南北界黄河，由北向南伸展，直至楚汉。《周南·汉广》已涉及长江、汉水，《召南·江有汜》亦属荆楚。二南分界之“陕”，为河南省陕县。陕县原城墙上，曾镶嵌一石柱，上刻有“周召分界处”等字样，后因修三门峡水库，城墙被毁，“周召分界石”被移送三门峡市博物馆保存。《毛诗》认为“二南”为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后人颇多非议。《卷耳》为思妇之作；《汝坟》有“王室如毁”句；《何被矣秣矣》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句，故“二南”中应有西周末乃至东周时的作品。

邶、鄘、卫，都是卫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赴鲁观乐，鲁国乐工为之演奏了《诗经》，季札亦随即作了评述：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语：“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北宫文子所说的卫诗，实为《邶风·柏舟》。可见春秋时代的人已将邶、鄘、卫三国之诗，都视为卫诗了。邶，故址在今河南省汤阴东南的北城镇；鄘，故址在今河南省汲县东北的鄘城；卫国始封君建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东北。邶、鄘、卫都是卫诗，在《诗经》中亦有证明，淇水源出河南林县（今林州市）东南临淇镇，东南经淇县流入卫河，并未遍及邶、鄘、卫，但在邶、鄘、卫之诗中都有反映。《左传·隐公元年》有：“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当作于隐公三年左右。《载驰》作于鲁闵公二年狄灭卫之后，同时作有《定之方中》，可见此二诗为卫国最晚的诗了。

王为王城的简称，故址在今河南洛阳。《汉书·地理志》云：“河南，故郑、鄆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王风显然都是东周以后的作品。

郑为姬姓国，宣王封其弟友于械林，是为郑桓公。幽王末年，

桓公迁国于东虢和桼之间。郑武公即位后，攻灭东虢和桼，建都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县。郑风为郑武公建国之后的作品，故全部是春秋时的作品。

齐为姜姓国，周武王封其大臣姜尚于今山东东北部和中部，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县），胡公迁薄姑，献公又迁回。《诗集传》说：“太公……既封于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为大国。”^⑤齐风中《南山》、《敝笱》为讥讽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私通的，事见《左传·桓公十八年》。《猗嗟》写齐国外甥鲁庄公射艺，应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其余作品时代不详。

魏国为姬姓国，周初封于今山西芮城东北。东周惠王十六年，为晋献公所灭，事见《左传·闵公元年》，所存诗作应是在此之前的作品。魏国土地干旱，人民贫穷，君主俭啬。朱熹说：“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⑥在十五国风中，魏风中讽刺统治者的诗作别具一格，为历代读《诗》者关注。

唐风即晋风。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叔虞于唐，以境内有晋水，故改称晋。春秋时武公迁都曲沃，献公时迁都绛，景公时迁都新田，始终围绕山西中部太原、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区。朱熹讲：“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⑦，点明了唐风的特点。《扬之水》诗，以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后来曲沃势力大了，欲杀昭侯而代之为背景，此事在鲁惠王三十年，故唐风应有东周初年的诗作。

秦为嬴姓国，周孝王封大臣非子于秦（即今甘肃天水县的故秦地），后土地逐渐扩张。平王东迁，秦仲之孙襄公派兵护驾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西周王畿及豳地尽归秦有。《黄鸟》诗讥讽秦穆公人殉的残暴行径，事见《左传·文公六年》。《汉书·地理志》说：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其在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

偕行。”及《车邻》、《骝骖》、《小戎》之篇，皆车马田猎之事。

可见崇尚气力、崇拜武功是秦风的主要特点，其创作时间应在东周末至春秋时。

陈即今河南省淮阳县，辖河南、安徽等几个邻近小县，《汉书·地理志》说：

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巫鬼。

淮阳四面皆水，水面宽窄不一。东南西北各有路通往城中。水光潋潋，蒹葭婆娑，令人心旷神怡。尤为难得的是，昔日陈人载歌载舞的聚集地——宛丘仍在。宛丘位于淮阳县城东南，为平川之地突兀耸立的几个土堆，虽高仅几十米，但依然十分显眼。经专家学者考证，这几个土堆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故陈人在此处聚集歌舞也就很自然了。《株林》一诗，讽刺陈灵公与夏姬私通，事见《左传·宣公十年》，即公元前 599 年，应是《诗经》中产生较晚的诗作了。除此之外，陈风中的其他诗作难以详考。

桧为妘姓国，“祝融之后妘姓所封溱、洧之间，郑灭之”^⑧。郑国灭桧于东周初年（前 769 年），《史记》、《韩非子》、《说苑》均有所记，可见桧风全部是西周时的作品。桧之都城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今密县东北尚有桧城，当是昔日之桧都。

曹为姬姓国，周武王封他的弟弟振铎于曹，都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菏泽、曹县等归其所辖。朱熹、方玉润认为《候人》作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先谦认为《下泉》诗作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 516 年），如王氏之言可信，那么《下泉》诗将是《诗经》产生最晚的一首。

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是周人先祖公刘所开发，为周人的发祥地之一。宗周建国后封予何人，不可详考。豳风全部作于西周时期，因西周亡后，此地归秦所有，再创作出的诗作应为秦风。《破斧》有“周公东征”，《东山》有“我徂东山，滔滔不归”，以及

《七月》诗的内容,可以断定这些诗是国风中创作最早的诗作之一。

二雅都是西周王畿之作,但也有人认为小雅中的《大东》、《都人士》等为东都人所作。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一般认为大雅大部分作于西周初年,其中最早的是《文王》,《吕氏春秋》认为该诗是周公旦所作;小部分作于西周后期,《瞻仰》、《召旻》为幽王时的作品。小雅的小部分作于西周初年,《鹿鸣》为成、康时的诗作;大部分作于西周后期,《正月》、《十月之交》均为厉、幽时的诗作。二雅大部分为贵族的诗作,少数诗歌如《采薇》、《何草不黄》为民歌。

周颂都是西周时代的祭祀之作。从内容看,多数为昭、穆以前的诗作,其中《大武》乐章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公》为周初庆贺武王伐纣胜利时所作^⑨。

鲁国的疆域在今山东东南部,周成王封周公儿子姬伯禽于鲁,都城即今山东曲阜。鲁颂中《閟宫》为僖公时代的奚斯所作,《泮水》亦为僖公时作。毛序认为《駉》是襄公时代的史克所作,可见鲁颂均为春秋时的作品。

商颂问题最为复杂,《国语·鲁语》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依据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应作于商代。《毛诗序》称:“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⑩今文经学派则认为《商颂》是春秋时宋国的作品。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里采用齐、鲁、韩三家观点,说“(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对于地域文化研究来讲,《商颂》作年认定,亦涉及作于安阳或作于商丘的问题,殷人都于安阳,宋人都于商丘。我们认为,就文化意蕴讲,《商颂》产于安阳的可能性会更大些,因为《商颂》所反映的宗教狂热,对祖先上帝的虔诚崇敬,对野蛮、凶残、恐怖、威力、勇武的歌颂和夸奖,在殷墟故址中的“妇好墓”、“车马坑”(2001年4月18日对外开放)中可以得到验证。

(四)《诗经》的成书与推广

一部诗集,时间跨越6个多世纪,作者囊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遍布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安徽等地,在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极不发达,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整的诗集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周太师。周太师——这些优秀的诗人兼音乐家们,首先是搜集诗,然后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最后将它推广出去。没有他们的努力,便没有《诗经》的今天。关于诗搜集,前人有采诗说和献诗说两种。《国语·周语》、《国语·晋语》、《左传·襄公十四年》均有献诗说的记载。采诗说主要见于《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汉书·艺文志》,《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佚文,《孟子·离娄篇》也有隐约的记载,此说后世虽有许多相左的意见,但亦可基本确立。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只有通过权力机构,才能完成大面积的搜集工作,然后加以筛选、加工、润色,并推广出去。以往,人们对搜集诗十分重视,以为这是满足统治者燕飨,充当教育贵族子弟教材以及了解民情的需要。事实上,搜集、整理诗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广诗,推广诗的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王室与地方的紧密联系,强化王族的统治。众所周知,周王室为了有效地统治各地,曾大封诸侯,让那些与王室有密切血缘关系的贵族们、那些立有军功的臣子们代表王室去管理地方。为了保证这些被封到各地的贵族不为各地的方言、不同的习俗所“异化”,王室通过诗歌,用统一的语言、文字、音韵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用代表王室思想的作品去统一各诸侯国贵族们的政治观点、审美意识、道德情操及宗教信仰等。也就是说,诗被用作周族加强内部联系的粘合剂,成为周人维系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礼记·乐记》有:“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①可见礼是用来区分君臣、上下、亲疏、贵贱的,乐

是用来团结内部、使之相亲相爱的。自然，乐并不等于诗，但乐与诗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时代，关系尤为密切。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诗经》大约是首开其例了。

(五)孔子与《诗经》

孔子是第一个将《诗经》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又是第一位研究《诗经》的大师。他精辟地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⑩“《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⑪“不学诗，无以言。”^⑫一部《论语》，竟有 14 处言及《诗》，孔子真正领会了《诗》的精髓。对《诗》的研究，孔子已完全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而是立体地、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俯视与研究《诗经》。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围绕着孔子“删诗说”成立与否争论不休。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诗经》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左传·隐公三年》便有引诗^⑬，而此时《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尚未问世；《论语·八佾》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⑭，今本《诗》便无最后一句；《荀子·天论》引《诗经》“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⑮今本《诗经》无此诗。可见从鲁隐公初年到战国末年，《诗经》作为一部典籍，始终处于一个流动状态，处于一个不断更新、补充、删节、完善的过程。孔子作为参与这一活动的重要学者，理所当然地应受到重视。研究孔子对《诗经》的认识与评价，尤其是研究孔子从《诗经》中汲取精华，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儒学的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哲学、宗教、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诗经》的《大序》与《小序》

《毛诗》学派能取代“三家诗”，《诗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读《诗经》必须研究《诗序》，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两宋之前，《诗序》的确是金科玉律，无人敢于质疑。宋人以大胆的、创新的目光审视以往的一切，诞生了以欧阳修为首的疑序派，朱熹成为集大成者。两宋之后，存序派、废序派唇枪舌战千余年。对此，我们认